

秦俊巧 著



民国后期 (1927 ~ 1945)

MINGUO
HOUQI

教育家办大学研究

JIAOYUJIA BANDAXUE YANJIU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民国后期 (1927 ~ 1945)

MINGUO
HOUQI

教育家办大学研究

JIAOYUJIA BANDAXUE YANJIU

秦俊巧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民国后期（1927～1945）教育家办大学研究 / 秦俊巧著.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7
ISBN 978-7-5545-1611-9

I . ①民… II . ①秦… III . ①高等学校—办学方针—研究—中国—1927～1945 ②高等学校—办学模式—研究—中国—1927～1945 IV . ① 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2161 号

作 者 秦俊巧
责任编辑 邵 莉

书 名 民国后期（1927～1945）教育家办大学研究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 050061)
印 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5-1611-9
定 价 32.00 元

序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倡导“教育家办学”，其根本目的在于让懂教育的人来办学校，让懂教育的人来管理教育，让所有的办学者和教育管理者都认识到教育教学工作的规律性，了解到教师和一切教育管理工作的专业性。“教育家办学”已经成为全国教育界的一个热点问题。

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在当代社会，我们要全面推进教育家办学的社会进程，需要研究中国教育家办学的历史和特殊规律性，需要研究教育家是如何成长的规律及其历史进程。在我国的中华民国时期，产生了一大批贡献卓著的教育家，如致力于创新中国新式教育制度的蔡元培，开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被誉为清华“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国学大师刘文典，提出生活教育理论的陶行知，从事乡村平民教育的晏阳初，开办中国第一所实验幼儿园的陈鹤琴等，他们都是教育领域的“大家”，是教育事业的中流砥柱，是教育思想和教育行为的领跑者。

秦俊巧是我的博士生。她的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是《民国后期（1927～1945）教育家办大学研究》。为什么让她确立这样一个专题呢？因为“钱学森之问”提出了两个重大问题，一个是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大量的创造性人才？二是中国当代社会如何真正使教育家办学取得突破性进展。温家宝总理特别强调“教育家办学问题”。为此，在国家研究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过程中，“教育家办学”问题成为需要重点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我参与了《教育规划纲要》的起草工作，深知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在俊巧确定博士论文题目时，我提议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民国后期（1927～1945）的教育家群体办大学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从这一时期教育家办大学的经验中获取一些经验和启迪。

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教育家办大学的群体呢？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为教育家办学提供了客观社会环境。鸦片战争后，各个帝国主义列强用洋枪洋炮敲开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政策，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社会由闭关锁国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第一次转型。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冲破了中国传统高等学校的模式，创办了一些新型的高等专科学校，清同治元年（1862）首先创办了京师同文馆，此后又废除科举制，创办福州船政学堂、京师大学堂等新式学堂，拟定《奏定学堂章程》，建立了新式教育体制。辛亥革命后，特别是在1926年到1936年间，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开启了中国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第二次转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加快发展。从1928年到1936年，全国高等专科以上学校由74所发展到108所，在校生由25198人增加到41922人，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高等教育体系。在108所高校中，国立26所，省立29所，私立53所，公立和民办高等教育体制基本确立。这一时期，也是从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中国化、制度化的过程。西方高等教育中国化的过程，包括学校体制、教学制度、学科专业设置、课程与教学、学校管理制度等经历了多方面多领域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高等学校的办学者们在借鉴国外教育经验的基础上，与中国的社会实际和教育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制度。在这一发展变革与制度创新过程中，造就了一大批教育家群体，并且形成教育家办大学的格局。可以说，在这一发展变革过程中，这些公立、私立大学校长，他们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创办者，同时承担着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创立者的责任，使他们在创办大学的过程中逐步成长为成熟的教育家。高等教育体系和高等教育制度的确立，为这一时期教育家的成长提供了基本社会环境。

教育救国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是这一时期教育家成长的内在动力源泉。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期间，先进的知识分子们把救亡图存之责任寄予教育的发展之上，掀起了教育救国的浪潮。学习西方，引进西方教育、科学，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客观趋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快速发展，高校迅速崛起，一大批教育家在其艰苦的办学条件下，不计个人得失，克服重重危机，为祖国发展培养出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成为近代教育、近代中国大学的先驱者。

战争与地方割据弱化了掌权者对教育的干涉与控制，为教育家的成长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社会环境。在南京政府统治的民国中后期，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贯穿于民国后

期（1927-1945）。战争当前，军事为先，特别是一定程度的地方割据，大大减弱了统治者对高等教育的干预，虽然政府重视教育，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来管教育，无形之中为中国的教育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改革环境。

艰苦的社会环境和缺乏保证的教育供给机制使办学者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成长出来一批杰出的教育家群体。民国后期（1927-1945）战火纷飞、内外战不断，经济形势虽有所好转，但军费开支浩大，通货膨胀严重，再加上新旧文化、东西文化矛盾冲突的交织，使得教育家办大学面临极大的困难和挑战。教育家们不停地“内修外练”，办学思想不断走向成熟，最终把大学办成一所所有世界影响的“中国的大学”。

每个教育家的成长都需要一方真正属于自己的水土，都需要个性化的发展。在中华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界办出的一些有特色的大学。在这些教育家群体中，一个人就是一部传奇，一个人就是一座丰碑，一个人就是一个时代，这几乎成为民国时期诸多教育家共有的特点。他们犹如擎天巨柱，撑起民国教育的灿烂星空。在秦俊巧的博士论文中，重点谈及了梅贻琦、张伯苓、陈裕光的办学之路。他们三位存在很大差异，如，梅贻琦的目标是“通才”，张伯苓的目标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陈裕光“要拿整个人生作为教育目标”，但从这些差异中不难看出他们之间的共性，即，他们都有明确的办学目标。还有，虽然梅贻琦尊崇的是“教授治校”，张伯苓制定的是“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陈裕光的组织管理方式是“共和”，但从中可以看到，他们都主张民主治校。另外，无论是张伯苓的“土货化”办学方针，还是陈裕光的“三制”和适合我国国情的改革举措，都反映出他们立足中国实际，以“中”化“西”的办学思路。总之，从梅贻琦的清华大学办学之路（国立大学）、张伯苓的南开大学办学之路（一般私立大学）、陈裕光的金陵大学办学之路（特殊的私立大学：教会大学）中，可以透视到属于教育家群体的特质及教育家办大学的共同特点，教育家群体的特质：有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有远大的教育理想与毕生的教育追求，有深厚的民族精神与广阔的国际视野，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取得丰硕的教育业绩和重大的创新成果，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认可度与深远的社会影响。

具体来说，这一时期教育家办大学有五个共同特点：一是心怀历史责任感，有明确办学目标；二是立足中国实际，以“中”化“西”；三是注重学校“软”、“硬”

环境建设；四是民主治校；五是注重基础，办出特色。这正是他们之为教育家，之为真教育家的最重要的品质，或者说条件。对教育的深刻信仰，必然激发对教育的无限忠诚和热爱。这就注定他们投身教育不会是为了做官，不会是为了往上爬，不会是为了个人功利。

教育家是什么模样？想想民国教育家，就不难发现，教育家脸上都有自信之光、荣耀之光、尊严之光。而那种光，无一例外地，都来自他们对教育的深刻信仰。在他们看来，教育不是他们的俸禄，教育不是他们的道具，他们不会拿教育做他们的敲门砖。他们做教育，既是入世，即为了救国救民，更是出世，即为了超越，为了自己的灵魂，为了诗意的栖居。有信仰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因投身教育而宁静，而满足，万丈红尘的诱惑，都无法将他们撼动。教育其实是他们的生命，甚至，高于他们个人的生命。时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为保护卷入学潮的安大学生，不惜与蒋介石当面顶撞，气得蒋介石动粗，打他两个嘴巴。他毫不示弱，竟当众飞起一脚猛踹蒋介石，而被关押七天。他们爱教育不是抽象的，他们爱教育，具体就表现为爱学校，爱教授，爱师生，往往像刘文典那样，爱到了不要命的地步。这方面最惊心动魄的，最感人的，是抗战时期的大学校长。中国大学西迁的千里流亡途中，他们像老鹰护雏一样，含辛茹苦地护佑着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学生。正是因为他们这种对教育的大爱，使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学，最艰难困苦的中国大学，其成就却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

在这样的圣徒的主持之下，教育何愁不能成为殿堂。而殿堂最大的特色，则在于她的神圣性。英国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有言：“世间很少有事物能比大学更美。当防线崩瘫，价值崩溃，水坝倒塌，洪水为害，前途变得灰暗，古迹沦为泥淖时，只要有大学屹立在那里，它就屹立闪光。”百年中国之所以不倒，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即在于我们有一代一代真教育家打造出来的真教育，真大学，真殿堂。她们是我们民族最后的精神堡垒，使我们民族纵然怎样历经磨难，仍有力量矗立于天地之间；纵然怎样艰难困苦，最终仍不难玉汝于成。一代一代真教育家用自己伟大的人格，不仅为自己挣得了尊严，为教育挣得了尊严，而且，为我们整个民族挣得了尊严。

这无疑是我们民族宝贵的财富。这财富应可化为今天的精神源泉。我们这个有着尊重教育悠久传统的文明古国，本不缺教育家。即在改革前后，也仍然有匡亚明、刘道玉及至当下朱清时等教育家的屡仆屡起，接续着民国教育家的薪火。但遗憾的是，

他们一直惨淡经营，难于突围。中国教育需要改革，教育家办学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但正是在这点上，恰恰太多误区，太大阻力。

通过研究可以引发我们很多思考，宏观层面：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历史时期大学却取得如此大的发展？微观层面：为什么民国后期一个或几个教育家即能成就一所好大学？是什么样的治校方略和办学措施使他们所办的大学影响如此深远？历史不是“故纸堆”，不是“陈年老账”，而是一面镜子，它由过去的素材做成，用于照亮现在与未来，丢掉历史就如同人失去了记忆。这一时期办大学的教育家们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治校经验，我们应该以史为鉴，在历史观照中，批判地继承与创新，探索更好的大学治校方针与方式，促进大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多年以来，我国教育取得了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发展。但并没有像民国时期涌现出那么多出类拔萃的教育家。这固然与教育发展水平有关。因为那个时期，正处在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的初创期，那些教育家都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开创者。他们的创造性工作造就了中国现代教育的雏形。而当代教育则是过去教育的继承、发展和完善。教育本身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今天的教育与初创时期教育的重大差异。但最大的区别还在于教育体制。我国现行的行政化、官僚化的大一统的办学体制，限制和抹杀了办学者的独特的创造性。再加上功利主义的办学观，以及出于认识上的糊涂和既得利益的使然，使当今的教育很少涌现出教育家群体。

但就整体上来说，今天的教育同样存在着成就教育家办学的社会条件。当今的教育正处在中国第三次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即中国社会正在完全意义上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城市化社会转型，而且世界范围内的第二次现代化，即由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知识经济社会的转型，同时在中国大地上推进。特别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始进入关键的攻坚阶段，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正在向世界强国迈进。这种经济社会环境为中国高等教育以及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变革、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需求、机遇和挑战。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呈现全面普及的新形势，高等教育正在由大众化的中后期阶段向普及阶段迈进，信息化社会中云计算的快速发展将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教学模式、教学方式、学习方式的变革。这些经济社会与教育的巨大变革，要求教育从体制、制度、教学模式、课程等全方位的变革与创新。这些正是当代教育家产生、成长的条件和沃土。

当前我们面临着许多问题，特别是大学的改革与创新，障碍着创新人才的培养。推进教育家办学、教育家办大学，回归独立性的大学精神，这已经成为当今大学教育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所在。这就需要政治的强势推动。能否像当年小平挂帅推进教育改革那样，为教育家群体的涌现创造更加宽松的政治、社会环境，为办学者、教育管理者成就自己的新传奇、新丰碑、新时代创造必要的条件，这是我们每一个有良心的教育工作者的盈盈期盼。

推进教育家办学，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必须解决，就是教育家的标准问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很难造就企业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却数不胜数。在推进教育体制变革的大环境下，我们不要把教育家的标准定得太高，凡是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有成熟的教育经验，有自己独立的教育思想，能够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并为教师和社会所公认者，都可称为“教育家”。

我们预祝：成长中的当代教育家也必将会像目前的企业家群体一样层出不穷，星光灿烂！

韩清林

2014年7月

目 录

| | |
|--|----|
| 导 论..... | 1 |
| 一、选题缘由及价值..... | 1 |
| (一) 选题缘由..... | 1 |
| (二) 选题价值..... | 3 |
| 二、对本选题相关问题的一些说明..... | 5 |
| (一) “教育家”的概念辨析..... | 6 |
| (二) 研究范围..... | 8 |
| (三) 研究现状..... | 9 |
| (四) 研究思路..... | 14 |
| (五) 研究方法..... | 14 |
| (六) 研究的创新点、难点与不足..... | 15 |
| 第 1 章 民国后期(1927~1945)教育家办大学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渊源..... | 17 |
| 1.1 历史背景..... | 17 |
| 1.1.1 民国后期的政治状况..... | 17 |
| 1.1.2 民国后期的经济状况..... | 19 |
| 1.1.3 民国后期的文化状况..... | 23 |
| 1.2 思想渊源..... | 24 |
| 1.2.1 民国早期的各种教育思潮..... | 24 |
| 1.2.2 早年的留学经历..... | 27 |
| 1.2.3 北大改革——民国大学改革的先锋..... | 34 |
| 第 2 章 民国后期(1927~1945)教育家办大学概述..... | 38 |
| 2.1 民国后期教育家办大学的历史阶段..... | 38 |
| 2.1.1 快速发展期..... | 38 |
| 2.1.2 极度困难期..... | 43 |
| 2.2 教育家在办大学过程中“内修外练”..... | 49 |
| 2.2.1 对外:妥善处理与教育部的关系..... | 50 |

| | |
|---|------------|
| 2.2.2 对内：努力使大学“本土化” | 56 |
| 第3章 民国后期（1927~1945）教育家办大学的群体分析 | 69 |
| 3.1 民国后期教育家们的共同特征..... | 69 |
| 3.1.1 远大的教育理想与毕生的教育追求..... | 69 |
| 3.1.2 长期的教育实践与丰硕的教育业绩..... | 73 |
| 3.1.3 先进的教育理论与重大的创新成果..... | 76 |
| 3.1.4 深厚的民族感情与广阔的国际视野..... | 77 |
| 3.1.5 密切关注和积极促进社会发展..... | 81 |
| 3.2 民国后期教育家办大学实践的共同特点..... | 83 |
| 3.2.1 心怀社会责任，明确办学目标..... | 83 |
| 3.2.2 立足中国实际，以“中”化“西” | 89 |
| 3.2.3 注重学校“硬”、“软”环境建设..... | 93 |
| 3.2.4 民主治校..... | 105 |
| 3.2.5 注重基础，突出特色..... | 112 |
| 第4章 民国后期（1927~1945）教育家办大学的个案分析 | 116 |
| 4.1 梅贻琦的清华大学办学之路..... | 116 |
| 4.1.1 担任母校校长..... | 117 |
| 4.1.2 培养目标：“通才” | 117 |
| 4.1.3 办学指导思想：学术自由..... | 124 |
| 4.1.4 组织管理模式：“教授治校” | 126 |
| 4.2 张伯苓的南开大学办学之路..... | 131 |
| 4.2.1 弃武从文办学堂..... | 132 |
| 4.2.2 培养目标：“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 132 |
| 4.2.3 办学指导思想：私立非私有..... | 138 |
| 4.2.4 组织管理方式：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 | 143 |
| 4.2.5 办学方针：土货化..... | 148 |
| 4.3 陈裕光的金陵大学办学之路..... | 153 |
| 4.3.1 金陵大学的第一任华人校长..... | 153 |

目 录

| | |
|---|------------|
| 4.3.2 办学目标：“拿整个人生作为教育目标” | 155 |
| 4.3.3 组织管理方式：“共和” | 157 |
| 4.3.4 办学方针：“三一制” | 160 |
| 4.3.5 适合我国国情的改革举措..... | 164 |
| 第 5 章 民国后期（1927~1945）教育家办大学对当今的启示..... | 167 |
| 5.1 教育家办学是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根本保证..... | 168 |
| 5.2 明确的办学目标是大学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 | 171 |
| 5.3 民主治校是大学保持活力的源泉..... | 173 |
| 5.4 学术自由是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命脉..... | 175 |
| 参考文献..... | 177 |

导 论

一、选题缘由及价值

(一) 选题缘由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的变革与转型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与此同时，各行各业对人才质量与规格的要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高级人才“总装车间”的大学，其教育教学质量、管理方式与水平能否适应当代社会的需要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之一。正因为如此，创建一批“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学，培养出大批社会发展所需的高质量学生成为当前国家和全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殷切期望。然而，什么是高水平大学？如何才能办出高水平的大学？这是必须首先弄清楚的问题。

笔者虽然是一名教育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但一直对这些迫切需要解答的现实问题感兴趣，因而这两个问题也一直萦绕在脑海。一个偶然的机，我翻开了一本关于梅贻琦办理清华大学的著作，书未读到一半，我的内心就受到了极大震撼——这不就是高水平大学吗？高水平大学不就应该这样办吗？受此启发，我又搜集了民国时期其它一些名校的相关资料进行研读，结果发现，在那个时代，“梅贻琦与清华大学现象”并非孤例，而是存在着一批杰出的教育家办出的一批在世界范围内都颇具影响的大学。从此，我将自己的研究范围集中于民国后期的教育家群体及其办理的一批知名大学，并认为这个领域的研究与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1. 适应“教育家办学”的时代要求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创造有利条件，鼓励教师 and 校长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创新教育思想、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形成教学特色和办学风格，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教育家办学”不只是一项临时措施，更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对学校教育的新诉求。这一诉求既是对陈旧的传统教育管理模式的理论反思，也是为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而进行的制度性探索。实现“教育家办学”的前提是要培育教育家，培育教育家的前提是建构适宜教育家成长的学校制度。实现这一诉求的当务之急是学校教育的制度变革，努力夯实催生教育家成长的基础。因此，需要借鉴历史经验，为当前的教育改革服务。

2、提高我国办学质量的现实需求

一个教育家，首先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办学者。学校教育的主体。只有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学校办学的自主权，并拥有一批真正称职、够格的教育工作者、管理人员，我们才可能使教育改革落到实处，深入到每一个学校内部，并从根本上改善当前的教育生态，从而按照教育本身的内在规律，让教育家来办教育。

学校是培养人的场所，而人是“自为的存在”，即在“自在存在”的基础上有所作为，不是本能地适应自然界，而是在了解自然界的基础上改造自然界。这就决定了人不断生成、不断更新的特征。“人虽然来自于自然，具有自然的属性，但人的本性却非出于先天的自然规定。事实上，人之为人是人类自我创造性活动的产物。这一点意味着两种意义，一方面，人既没有被给予的前定本性，人的本性也不是一经确定便永远不变；另一方面，人之为人的本质永远处于没有终结的创新之中，始终具有开放、不定的性质。人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存在。人的生命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①。要把这样一个不断生成、不断变化的群体培养好何其不宜，更何况教师的生命也是在不断更新之中。没有任何一种办学方式能一劳永逸，必须根据实际灵活变换，这就对办学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国的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其办学的指导思想、教育方针、研究和改革的蓝图等无不影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办学者必须立足当前、兼顾长远，能够整体统筹、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从人、社会、经济等多种动态因素的变化关系中，迅速捕捉信息，透析问题的本质，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最优的方案。从为提高当代大学办学质量提供历史智慧出发，笔者选取了本课题作为研究方向。

3. 违背教育规律的办大学现象仍然存在

目前，我国一些高校充斥着商业气息，“效益至上”、“批量生产”、“标准规范”的企业化印迹依然可见。有些校长，把学校等同于企业，专注于经济利益的获取，“抢经费”“乱收费”是他们的主要任务。有的校长，虽兢兢业业，热衷于教育事业，但没有教育经历、不懂教育规律，只能刻板地按照上级下发的文件管理学校，不会根据学校实际状况与当地环境等随机应变，学校应有的活力消失殆尽，严重影响学校教育功能的发挥与教育质量的提高，这样的校长空有雄心壮志，无半点业绩可言。而有的校长通晓

^① 欧巧云. 当代大学生生命教育研究[M].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4). 16.

教育规律，懂得如何办学，但缺乏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更有甚者，有的校长把学校当作升迁的跳板，只顾揣摩上级的意图，谋短期的政绩和自己的前程，根本无心于师生的发展。这些“外行办学”的存在，严重阻碍着学生的发展，是我国教育质量提高的一大障碍。出于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笔者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能为防止我国高等教育滑向商业化、衙门化的现象尽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

（二）选题价值

1. 有助于深化中国教育学基本理论研究

自 1806 年赫尔巴特出版《普通教育学》，教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不断发展和完善，直至今日，教育学已经分化为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政治学、教育技术学、高等教育学、中等教育学、基础教育学……，成为包含多种分支学科、边缘学科以及交叉学科的学科群。但教育学的发展离不开教育学者的点滴贡献，“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教育学研究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绩，正是教育学者刻苦钻研的结果。他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用客观的眼光审视已有的教育理论，不盲从、不迷信、不极端，既不全盘否定，也不全盘接受，而是在批判中创新，在创新中进步，不断提出新思想、新观念。教育理论作为整个教育学科群的原点和基础，它研究的是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经济、教育与人以及三者之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多维互动的关系，对其任何一方面的研究都能为中国教育学基本理论的深化和发展添砖加瓦。

本文选取与当今社会实际密切结合，迫切需要寻找解决之道的“教育家办学”这一专题作为研究对象，详细介绍了民国后期教育家的办学思想、办学方式、办学经验等，涉及教育与社会、经济、政策、人等多重关系的研究与分析，应该有助于深化和细化我国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2. 能够丰富教育史学科的研究

自 1904 年《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进士馆、师范学堂中必需设教育史科”以来，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时至今日，教育史的研究已经深入到各个层面、不同时间段，但依然有很多空白之处，需要不断挖掘与创新，以促使教育史学科更加完善、成熟。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其重要的时期，新旧思想的交替、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交织、社会环境的多变等，使各种关系纷繁复杂，难以理清。教育在这种社会环境

中生存，自然是夹缝中求生，困难重重。对这段教育历史的回顾，不仅能使教育史研究更加丰腴，而且能总结一些经验教训，以指导当今的教育发展。本文选取民国后期（1927~1945）这一时间段，并集中于高等教育这一层次，以期对民国时期教育的研究更加细化，对中国教育史不失是一点补充。

3. 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当代改革与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历史经验从来都是现实实践的重要智慧源泉。“高等教育管理理论的研究，离开了大学校长们丰富的、具体的办学经验，只是从一般管理原则推论出高等教育管理理论，或从一时的得失论述管理的成败，就很难写出内容丰富、科学性强的专著。尤其是涉及到高等教育一些规律性的根本问题，往往非一时所能看清楚。也不是靠有局限性的实验或实践所能解决，必须从历史角度加以考察研究才能有深度、有远见”。^①在我国大学教育的发展道路上，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先驱们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为教育的发展奉献了一生，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奠基与成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应该认真总结这些既往办学者的经验教训，继承与发扬其优良传统，避免其已经走过的弯路，克服其弊端遗留的消极影响。只有这样，历史才能成为财富而不是包袱，而人们也只有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对历史的超越。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重复前人已经走过的路，真正以前人已经达到的高度为起点去攀登新的高峰”^②。本文详细阐述了民国后期教育家办大学的思想 and 实践，以期对当今办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提供借鉴。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冷”、无人问津的专业，这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经济大环境下，人们越来越急功近利，凡事皆追求眼前的效率与利益；另一方面，恐怕与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无视社会需求的缺陷也难脱干系。

“欲通今者则必先知古”。“过去”与“现在”的区分是相对的，历史与现实的区分也是相对的，今天的教育是昨天教育的延续与发展，是明天教育的起点和基础，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谁也不能断然分开。研究教育的过去，正是为了更好地看清现在，以更好的方式建设未来。正如德国史学家、教育家雅斯贝尔斯所说：“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见自己就好像站在时间中的一点，惊奇地注视着过去和未来，对过去我们看得愈清晰，

^①周川，黄旭.百年之功——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教育家精神[M].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4).序.

^②王运来.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总序2-3.

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就愈多。”^①列宁也一再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主要发展去考察它现在是怎样的”^②，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有些学者认为教育史研究的唯一目的和任务就是弄清历史事实本身，只有这样才是一心一意钻研学术，这种观点不仅不可取，而且是不现实的。正如李大钊所说：“社会与历史二者是同质而异观的，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一切史学研究，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陈编，乃是过去、现在、未来和永世生存的人类生活的全部生命”。^③教育史研究不能整天埋头于故纸堆里，而应关注现实，思考未来。对“过去”的深入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今天的问题，而且可以引导我们预见明天的发展。

“中国高等教育从一百多年前走来，它与现今高等教育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近代以来大学校长们用美好理想和教育实践酝积形成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治校经验，以及他们承先启后、发扬光大、舍我其谁的心志，必定对跨入新世纪的人们认识高等教育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提供有益的思考与借鉴。”^④本文对民国后期教育家办大学的思想理念、组织原则、管理方式等作了详细的论述，这不仅仅是为了颂扬那个时期的教育家有多么伟大与崇高，更是为了在梳理与分析这些教育家办学历史的基础上，找到当下高等教育办学之路上存在的问题，并努力探寻其出路。笔者认为，回顾教育历史的最高使命就在于：通过挖掘历史材料，找出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便更清晰、更全面地认识问题，作出更准确、更客观的判断，提出更有效、更完美的解决方式。正如英国教育史学家哈德罗·珀金所说：“真正的历史学并不是一味按照年代顺序挖掘整理史实材料的学科，而是一门解决问题的学科，它向现实世界提出种种问题，并努力探寻问题答案。”^⑤历史上著名教育家办学的追求和核心理念也恰与此相通。因此，本选题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对本选题相关问题的一些说明

在进行详细论述之前，有必要对本选题的一些重要问题先作适当说明。

^① [德] 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 什么是教育[M]. 三联书店，1991. 58.

^② 列宁. 列宁全集(第29卷)[M]. 人民出版社，1956. 430.

^③ 李大钊：史观[A]. 李大钊选集[C]. 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129.

^④ 黄延复、钟秀斌著. 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4). 总序7-8.

^⑤ [英] 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 217.